

讲述

□ 魏国良

# 一片冰心在玉壶

## ——我记忆中民革帮扶纳雍的故事

### “纳雍赫，去不得”

贵州有一句老话，“威纳赫，去不得”，“威”即威宁，“纳”即纳雍，“赫”即赫章。这句话曾是这方偏远土地的沉痛记忆。有一篇报道这样写道：“在西部一些偏远地区，有的人家甚至没有床，簸箕当床，木头做枕，苞谷叶子就是被褥。一些穷乡僻壤满山是石，在难得找到的巴掌大的土里栽上一株玉米，如果一个星期不下雨，玉米就枯死了。”从纳雍回来的人说，这写的就是那里。

1988年6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建立毕节试验区。由此，正式开启了一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力量共同倾力支持，以培育支柱产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示范带动、促进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全面发展等为重点，持续不断探索解决喀斯特贫困山区实现脱贫和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历史。

1991年，民革中央领导人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毕节试验区的纳雍县作为定点扶贫联系县，并提出“纳雍不脱贫，民革不脱钩；纳雍脱了贫，民革不断线”。这是民革对纳雍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参与脱贫攻坚的铿锵誓言。

### 孔雀东南飞，老马向西行

“孔雀东南飞，老马向西行”。改革开放之初，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人争先恐后地前往东南沿海地区追寻梦想；老一代知识分子却怀揣报国热情自愿到“老、少、边、穷”等艰苦地区开展培训讲学、经济咨询、科技推广等工作。这也正是民主党派智力支边扶贫工作的特点和来历。

2002年7月，我第一次去纳雍。从北京到贵阳后在贵阳住一晚，第二天要经过七八个小时车程到达纳雍县城，然后住在全县唯一的招待所。从县城到各个乡镇还有几个小时的车程，而乡镇是没有宾馆住宿的。那天从县招待所出发，郑心楠大姐问我，能不能吃点苦，住在乡镇上，这样就能节省很多路上的时间。于是，我有了近距离接触民革扶贫专家的机会。

那天，我被安排住在乡政府临时办公楼上李国瑞教授的简易宿舍里。这是一间除了书桌台灯和床铺再没有任何家具电器的房间。当我见到扶贫专家之一的李国瑞教授的时候，简直傻眼了。只见他脚穿一双黄胶解放鞋，身穿褪色发黄的衬衣，里边的汗衫满是洞洞眼。而就是这样一位外表和当地农民没有任何区别的人，开启了纳雍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幕。

李国瑞是民革安顺市委原主委、安顺市科协原副主席。早在1992年4月，民革中央首次组织农、林、牧、化工、地矿、医疗等方面的11位专家赴纳雍县考察，李国瑞就是其中一员。从1992年到2000年，李国瑞为当地编写产业规划、引进良种良法、开展人才培训、推广实用技术，往返于纳雍20多次。2001年，年过六旬的李国瑞，受民革中央和民革贵州省委委派，再次来到纳雍县蹲点开展智力帮扶工作。

纳雍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县，农业以种粮为主，过去，农民养猪为过年，养鸡为换钱，没有商品经济意识。随着城镇化建设，商品蔬菜需求量与日俱增。李国瑞教授为纳雍县确立将蔬菜产业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指导实施商品蔬菜示范种植，培养一批蔬菜专业人才和农民技术骨干。不到10年，蔬菜生产不仅满足了本县的需要，还远销到四川、重庆等地。2019年，纳雍蔬菜年产量达12亿元，成为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脱贫主导产业。

还有很多像李国瑞教授一样的扶贫专家：陈济生、章谨、黄良炉、李梅芳、张文炳、许允文、夏玉芳、潘学军、卢勇、张晓燕、曾伟……以及曾经在纳雍工作过的扶贫干部：沈学斌、杨新人、郑心楠、邱彬、张长宏、怀怀东、刘顺福、杨海燕、井建军、吕素琴、王月震……他们默默无闻地将足迹留在了乌蒙山的深处，也把民革两个字深深印在了纳雍人民的心里。

### 汽车开到家门口，梦想变现实

纳雍县距离省会贵阳200公里。6年前，还需要乘坐5个小时以上的汽车，而且是盘山路。假若遇到交通事故，走上个7、8个小时也属正常。我在陪同各地民革党员专家到纳雍县开展调研或培训活动的時候，大家对这里最深刻的印象是山高路远、交通不便。

20多年前，一位纳雍县的杨老师讲说，如果纳雍有了高速公路，有了火车那就太好了……他话没讲完，就被一阵嘲笑打断。因为纳雍到1995年才有了全县第一条柏油马路，在他们看来，纳雍这样的穷县能够修上“铁公鸡”简直是天方夜谭。事实上，在国家一系列战略规划部署下，特别是对西部贫困地区的倾斜性政策支持下，纳雍人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变成了现实。

2000年，经民革中央积极协助，纳雍县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性机遇，立项建设的纳雍电厂成为“西电东送”第一批火电工程项目。2003年10月，纳雍电厂一期120万千瓦火电厂成功并网发电，二期180万千瓦火电厂破土动工，带动了全县煤炭资源的开发。

2015年10月，厦蓉高速纳雍段宣告通车，从此纳雍县进入贵阳市2小时经济圈。2016年1月，织（金）纳（雍）铁路正式通车运营，每天对开一趟快速旅客列车，票价40.50元。2013年6月，毕节飞雄机

场正式通航，从此毕节人拥有了更加快捷的交通方式。

有一件事我印象深刻。2013年，按照高速公路设计规划，将有厦蓉和瑞杭两条高速过境纳雍并在县内交汇，纳雍人无不欢欣鼓舞。但是纳雍县很快发现高速公路与县城的连接线并未纳入规划，需由县级财政出资修建。纳雍县向民革中央紧急求援，希望民革中央呼吁交通部将连接线纳入规划，由国高公司投资修建。在民革中央和纳雍县充分说明情况后，交通部规划司一位领导说，民主党派如此高度重视和支持贫困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部作为职能部门更是责无旁贷。这样一下子就为县里争取了2000多万的建设资金。当时我们没有告诉交通部的同志们，纳雍县的第一条柏油路正是1993年时任民革中央主席的李沛瑶亲笔致函交通部，呼吁交通部拨款改造修建的。

### 援建学校，播撒希望的种子

教育是脱贫的治本之策、拔根之道。1992年，民革中央首次组织农、林、牧、化工、地矿、医疗等方面专家赴纳雍县考察，被这里的教育发展现状深深震撼。从此，支持农村教育发展，提高人口素质便成为民革扶贫工作的起点和重点。1992年至2000年，民革中央机关将每年的2月18日定为“献爱心日”，全员参与捐款捐物资助纳雍县失学未成年人。民革中央动员全部力量，利用一切社会关系筹集资金援建希望小学。1992年9月1日，民革中央帮助援建的第一所学校——“陶家寨希望小学”落成并投入使用。时任民革中央主席朱学范为学校题写校名。

此后，姑开乡发寨希望小学、董地乡沙落希望小学、阳长镇博爱学校、水东乡通和沙坝希望小学、姑开乡上海和平希望小学等民革援建的学校先后落成。历经多年，很多民革援建的小学校仍然在使用，并且成为当地乡村远近闻名的学校。

2020年6月11日，由民革中央联系中国通和经济中心出资援建的水东镇通和沙坝希望小学给民革中央原主席周铁农写了一封感谢信，孩子们在信中说：“鱼儿感谢水流，花儿感谢大地，雄鹰感谢蓝天……是周爷爷您引入资金建立起来的一所希望小学，让我们村里这些孩子不用走很远的路上学，我们感到非常幸福。您是我们童年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人……”信中中提到，孩子们还录制了学校的校歌，并通过U盘寄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

6月29日，周铁农向学生们回信，“希望大家怀着了一颗感恩的心，不辜负每一个帮助过你们的人，不辜负每一个为了让你们的生活变得美好而努力工作的人们。希望大家只争朝夕、不负韶华，以更优异的成绩回报父母、回报学校、回报社会对你们的培养。长大以后用自己的知识和双手把家乡建设的更加美好。”

### 大学生越来越多，村子有希望了

2010年7月，中央统战部协调各民主党派第一次成建制地向毕节试验区派驻挂职扶贫干部。民革对口扶贫纳雍县，于是我被派往纳雍县阳长镇挂职锻炼。

阳长镇核桃寨村是2001年民革中央选择确定的重点扶贫联系村。2002年，民革中央采用参与扶贫方法在该村开展帮扶工作，即农民自主选择和组织实施扶贫项目，自我监督和管理扶贫资金的一种赋权扶贫模式。当时，农民在用染了色的苞谷秆作为选票投票选择扶贫项目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把建小学校作为重点项目。于是，由民革出资、村民施工的核桃寨村小学教学点很快建成，村里低年级的学生可就近上学。还有很多党员一对一结对帮扶家庭贫困的孩子。2010年4月，时任民革金华市委会主委张解放到核桃寨村调研，发现该村没有几个高中生，大学生更是稀有。当时村里的标语是“读完初中，再去打工”。张解放说，要往长远看，大学生越来越多了，村子就有希望了。于是民革党员筹资建立了一个村级奖学金，不论学习好坏，也不论家庭是否贫困，只要读高中（职高也算）就发800元奖金，而且张红榜公开。连续几年下来，极大地鼓舞了村民送孩子读高中的信心。到2020年7月，核桃寨村已经出了54名大学生。

### 倾情奉献写华章，一片冰心在玉壶

2020年6月4日，在民革中央定点扶贫工作督办会上，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郑建邦动情地说：“作为民革党员，在美好的历史机遇下参与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来，并且最终取得辉煌的成果，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振奋的。”此时，纳雍县已经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全部清零，即将和最后一批52个贫困村同时脱贫出列。

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归功于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归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归功于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民革人矢志不渝，不计得失地投入脱贫攻坚，汇聚了最大的力量，留下了最深的印记，做出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选择。这是一种情怀，一种报效国家、奉献价值的情怀；这是一种责任，一种参政为民、服务社会的责任；这是一种信仰，一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

（魏国良，民革中央社会服务部经济处处长。2001年以来，见证、参与了民革中央在纳雍县的系列帮扶工作。）

# 蔡锷将军在毕节写家书

□ 翟显长

2011年秋，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国家博物馆举办“馆藏辛亥革命名家墨迹展”。展出的墨迹中，有蔡锷将军长子蔡瑞生捐献的9封家书，其中3封写于毕节！

慧英贤妹青珠：别后苦相忆，想同之也。十六号启行，按站北进，沿途俱安适。所部各队均恪守纪律，士气尤为奋厉。廿五抵黔境之瓮头铺，预计一星期内可抵毕节，两星期内可入川境与故人接触矣。出发后，身体较以前健适，喉病已大愈，夜间无盗汗，每日步行约二十里，余则乘马或坐轿，饮食尤增。从前间作头痛，今则毫无此症象发生，颇自慰也。堂上以下，闻余此次举动，初当骇怪，继必坦然。盖母亲素明大义而有胆识，必不以为不肖，从而忧虑之也……何君国辅亦甚健适，并闻。分皖后希寄一电，为男则云某日迁居东门，为女则云某日迁西门，母子均吉则云新宅颇安适可也。此间妆安！名心印。一月廿七于威宁发。

在1916年1月27日在威宁所写的这封家信中，将军提到的“箭头铺”，即今威宁自治县金斗乡，南面与云南宣威杨柳乡隔河相望，被称为威宁的“南大门”；“十六号启行”，即1月16日，将军及其总司令部，率领护国军第一军三个梯团从昆明出发，入川讨袁；“喉病”由将军早年所患肺结核引起，当时已经非常严重，后来的“红军之父”朱德回忆过1915年12月15日见到将军的情景：肺结核正威胁着他的生命，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将军的母亲王再秀，时年54岁，住将军老家湖南邵阳蒋河桥老宅；“何国辅”又名何鹏翔，是将军的湖南同乡，时任将军行营少将副官长；7月29日，将军率部进入成都，数万军民在城东大面铺夹道欢迎，此时将军已几乎不能说话，只能挥手示意，并请何国辅代为答谢；1916年11月8日，将军因细菌感染喉疾不治，34岁在日本福冈医院逝世，带着孩子辛勤陪伴的潘蕙英，将夫君一缕头发加入自己发髻，从此以教书为生守节终老，1956年逝世。

27日前后，蔡锷将军在威宁城郊草海东南角“六桥柳堤”成功举行阅兵式，后来草海曾因此一度改名为“松坡湖”，湖边还建有“松坡亭”。

慧英贤妹次女：由威宁发一函，计达。廿九号于贵州之毕节，因等待队伍，在此驻扎两日，现定二月一号向永宁出发。我军左纵队已占领四川之叙

州、自流井、南溪、江安一带；右纵队之董团，今晚可进取永宁；旬日之内，即可会师泸州，三星期内定可抵成都矣。预想成、泸之间，必有几场恶战。我军士气百倍，无不一以当十，逆军虽顽强，必能操胜算也。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但川省兵燹连年，拮据安群，颇不易易耳。手此即询近好。锷言。一月卅一号于毕节。

这是将军1月31日在毕节行营写给潘夫人的第一封信。信中所说要等待的队伍，是顾品珍的第三梯团，下辖第五、第六两个支队；“永宁”是今四川省泸州市下辖的叙永县的古称，“叙州”即今宜宾市下辖的叙州区；“左纵队”为刘云峰所辖第一梯团，此前已从昭通、盐津攻入四川；“右纵队之董团”即第二梯团董鸿勋支队，是护国军中路军第一军的先头部队，1月26日已从毕节开赴四川战场。在指挥若定、胸有成竹的同时，将军做了以身殉国的最坏打算，铁誓铮铮，掷地有声：“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心，万一为敌贼暗算，或战死疆场，决无所悔！”

上一封信刚发出不久，晚上将近十点，将军的岳父从昆明发来“报喜”电报：潘蕙英又为蔡锷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母子俩都平平安安。接到电报，蔡锷又庆幸又欣慰又感恩，赶紧又修书一封：

慧英贤妹如见：顷发一函，计与此信同到。顷接尊严电示，吾妹复生一男，母子俱吉等因。曷胜欣慰！吾妹连年诞生麟儿，殆天公所以报吾妹为子之孝，为母之慈，何幸如之！惜堂上远隔在湘，电音阻塞，不能闻斯喜北耳。今日为我军占领永宁之日，而得此佳报，与前年端午日在天津病时，而得瑞生诞生之电遥遥相对，可贺也。吾妹于归后连年生育，因之血气大亏，宜善加调摄。如有良好之乳母，总以早为雇请为宜。儿名可命名为永宁，以志纪念。余尚存若干款，在解义山处，已揭拨交于尊严处，不久想可交到也。手此即问君安。锷言。一月卅一号夜十钟，于毕节行营。

“尊”即“令尊”，“严”即“严父”，此处用以称呼潘夫人的父亲；将军的岳父潘廷权，科举贡生，曾任社会救助机构“普济堂”堂长，是昆明城内的开明士绅；“为子之孝”——潘夫人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接受过儒家传统教

育，也受过西式教育，曾获当时云南省政府颁发的“至性过人”匾额，以纯孝知名；“于归”即女子出嫁到夫家；将军次子蔡永宁，从北京辅仁大学毕业后到滇西担任银行经理，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当讲师，任过编辑和科长，1968年逝世。

写这两封家信的时间，是将军在毕节三个晚上的最后一晚。2月1日，将军按原计划率领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及三个支队，从毕节城出北镇关，沿古盐茶道到赤水南关村，架设浮桥夜渡赤水河，再翻越海拔1900多米的雪山关，于5日抵达叙永城。将军写于1916年2月的《军中杂诗二首》，描述了自己此行入川讨袁的艰辛，还有自己“挥刀杀贼”“指日观兵白帝城”的必胜信念：

蜀道崎岖也可行，人心艰险最难平。挥刀杀贼男儿事，指日观兵白帝城。绝壁荒山二月寒，风尖如刃月如丸。军中夜半披衣坐，热血填胸睡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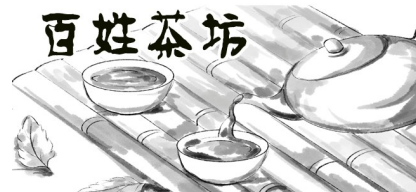
蔡锷率部抵达毕节城的当天，时任毕节县知事聂树楷即率绅、商、学、农各界社会名流，在南门口往大水口方向夹道欢迎。当晚，聂知事又同电报局局长廖桂卿、商会会长刘殿英、“少白楼”老板李春庭等，将蔡锷、朱德等护国军将领请至龙蟠山下享誉三省边界的“少白楼”，设酒宴为他们接风洗尘。

在毕节期间，蔡锷及其总司令部，驻扎在原地区公安处所在毕节盐务处。护国军其余各部，分散居住在南门口“宁家龙门”、今七星关区人民医院所在“双井寺”等地。

蔡锷将军还在毕节大校场内举行了阅兵式，围观的群众成百上千。这一次阅兵式激起了热烈反响，随后在城内进行了新兵招募，原本一千八百人不到的三个支队，变成了两千多人。

驻扎毕节期间，护国军军纪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护国战争胜利后不久，毕节人民即在离今珠市路路口不到百米处修建“护国寺”以隆重纪念缅怀。“护国寺”早已“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原来还剩几个石雕柱石和一面砖墙，砖墙上砌有不超过刻有“護國寺”3字的墙砖，今天只在《古城记忆》的老照片里依稀仿佛……

## 毕节故事·掌故



## 百姓茶坊

小时候家里穷，我经常住在外婆家。

吃了晚饭，外婆点亮煤油灯，我和几个表弟就围坐到外婆身边，跟着她念童谣。煤油灯与外婆口中那些好听的童谣，便成了童年最温暖的记忆。

外婆、外公和舅舅都有吸旱烟的习惯。冬天的夜晚，一家人围坐在煤炭火堆旁，他们便各自在旱烟袋中拿出皱巴巴的烟叶，放在嘴里吸吮好一会，掐成小截小截的，再卷成小卷，装在烟斗里，放到燃着的煤油灯上，吧嗒吧嗒地吸气，接着一串串呛人的烟味就从他们口中呼出。

村里刚通电那阵，外婆装好旱烟，经常会拿着烟斗凑到电灯泡上去点火。老点不着，外婆就骂电灯不好，但并不只是因为点不着旱烟，主要是觉得用电灯需要电费不划算，且没有煤油灯方便。

村里的电是村民们东拼西凑地筹钱，用歪歪斜斜的木杆子牵了电线，才勉强引来的。因为没钱买变压器，电压不稳定，家家户户的电灯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条件好点的家庭，就安装低压灯泡，开关一拉，明晃晃的，照得人发白。一到深夜，电压恢复正常后，必须马上关掉开关，否则“砰”的一声就烧爆了。

这不怪外婆要数落电灯的不好。所以，即使通电了，外婆还是会经常使用煤油灯。

外婆家的煤油灯做得十分精致，圆圆的玻璃瓶，盖子上钻一个筷子粗细的孔，一根铝皮卷成的灯管卡在瓶盖上，从黑旧的棉絮上拔下一团棉花，搓成均匀的长条，穿过灯管就成了灯芯。再往瓶子里装入煤油，用细铁丝拴在玻璃瓶颈子上，铁丝另一端弯成一个钩子，方便挂在墙壁的缝隙里。到了玉米收成或

## 外婆的煤油灯

□ 覃文友

是烟熏烘烤的季节，时常需要加班干活，外婆家就到处挂满自制的煤油灯。在昏黄的灯光下，外婆一边剥玉米，一边细细地哼唱“正月里来正月正……”，从正月初一直唱到腊月三十。

外婆家住的是泥土砌筑的土楼房，墙壁上经常挂煤油灯的地方，被熏得黑黢黢一片。初中三年，我很多作业都在外婆家的煤油灯下完成，一不小心打瞌睡，额头上的头发就会被烧去一大撮，发出阵阵难闻的臭味，以至于前额的头发经常长不整齐。夜晚在煤油灯下做完作业，第二天洗脸不仔细，两个鼻洞里黑乎乎的，经常被同学们嘲笑。

在外婆家堂屋里，墙上贴有一张陈旧的奖状，是奖给“三八红旗手”周淑菊同志的。奖状证明了年轻时候的外婆是一个劳动能手，一个参加农村建设的积极分子。外婆没有读过书，识不了几个字，但是对我却很严格。每次读书、写作业到很晚，外婆总是在旁边安静地陪着，不时向我投来鼓励的目光。在外婆家的煤油灯下，我背诵了很多古诗文，学会用日记描写外婆，用铅笔在纸上勾画她为我们缝补衣服的样子。

我有四个表弟，全部是外婆一手带大的。冬天睡觉，外婆怕我们冷，会在睡前用一块布放在炭火上，烤得热烘烘暖和和的，包在我们脚丫子上。然后坐在床沿边，轻轻拍打被子，轻轻地唱：“么妹乖乖睡，妈妈去睡睡，寤得半升糠，拿给么妹搅面汤……”待被窝暖和了，我们都睡熟了，她才轻轻地脱下我们的贴身衣物，架在火上烤，用手一拍，衣服上的虱子掉到炉火里，发出“毕毕剥剥”的声响。烤完虱子后，外婆又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长一针短一针地缝缝补补。

小时候在外婆家过年，她经常讲“三十夜的火，十五夜的灯”。除夕的晚

上，她一定要把家中的火烧得很旺，全家人吃过年夜饭，围坐在火堆旁，就着煤油灯说话、打扑克，直到午夜十二点过后才能睡觉，外婆说这叫“守坟土坎”。元宵节时，她要把一盏盏煤油灯点到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在不同的地方表示不同的愿望：点在灶台，希望灶火越烧越旺；点在用水条铺的楼上，希望老鼠不来吃粮食；点在牛圈边，希望牛儿越长越壮；点在菜园子，希望来年菜苗长势好……每到一处，外婆都要絮絮叨叨念上一通。

外婆一辈子没有走出过村子，最远的地方是到十里外的地方赶集。我小时候常给外婆讲，等我长大后要带她到很远的地方去，看看山外面的世界。

1998年，我初中毕业，顺利考取县城的师范学校。进城读书那天，外婆哭了，辛劳一辈子都没有流过一滴泪水的外婆，伤心地哭了。也就是那年的冬天，天上还没有飘雪花，我正准备回去告诉外婆，黔西县城的楼房高大，满街都是黄包车在跑的时候，她却永远离开了我们。一辈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缝缝补补、在守望中艰难度日的外婆，一粥一饭把我们喂养长大的外婆，走完了她朴实无华的一生。

外婆离开已经二十多年了，煤油灯早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今，每年春节，我和弟弟妹妹与表哥们都要去看外婆，在她的台前陪她说话，用一盏长明灯，把她的“家”照得透亮。